山海寻梦

“在黄河面前，我们都是小学生”

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秀峰 裴小阁 张相成

浩荡黄河在神州大地上铺展出雄浑“几”字。“三年两决口、百年一改道”，10个字写尽了黄河治理的难度。

为了黄河安澜，不少仁人志士竭尽心力寻策问计。作为治黄的参与者、建设者、见证者，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张金良参与治黄40多年。

他说：“在黄河面前，我们都是小学生，未知大于已知。治黄不是一代人、两代人的事，是持久的坚守。”

一张没吃到的白面饼

故事的起点，是一张没能吃到的白面饼。

1975年8月，河南遭遇特大暴雨，板桥、石漫滩两座水库相继垮坝，洪水横扫千里。那一年张金良12岁，家在河南洛阳，全家都被组织起来支援灾区：一家一户发一袋面，烙成大饼，再汇集起来，空投到受灾的地方。

灶台边，母亲一张接一张地烙饼，张金良负责添柴烧火，眼睛却盯着平时难得一见的白面饼。他想伸手去拿，被母亲轻轻拦住：“这是给灾区的，不能吃。”

张金良最终也没能尝上一口饼，可他心里冒出一个念头：为什么会发这么大的水灾？长大一定要去学水利。

这个念头没有被时间冲淡。填报高考志愿时，张金良把所有志愿都填成水利工程。1985年，张金良从天津大学毕业。彼时，同学中有人南下闯荡，有人继续深造。一份来自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分配通知让他没有任何犹豫：“学水利不去治理黄河，就像当兵没上过战场。”

读懂“母亲”的脾气

1985年7月，张金良到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报到，第二天就上了大坝，住进工地。这一住，就是几年。

第一次站在奔腾的黄河岸边，他怔住了——浑浊的河水激流而下，与家乡宁静的塘坝完全是两个世界。

“我真的能读懂黄河吗？”年轻的张金良在心中自问。

面对陌生，他选择了最笨也最踏实的路：徜徉在纸页之间，又投身于河道之上。

张金良在三门峡前后待了十几年。他参与溢流坝二期改建，主持6号、7号机组扩装，参与三门峡底孔修复等水下工程；为了摸清河性，他徒步走进河滩，用双脚丈量了160多公里的库区，哪一段容易淤、哪一处容易出险，都记在心里。

“那时候年轻，不觉得苦。测量的每一个数据都关乎上下游千百万人的安危。”张金良说。

1996年，张金良组织团队开展三门峡水库汛期浑水发电水库调度原型试验，历经无数次失败与重来，最终确立“洪水排沙、平水兴利”的运用规则。这项探索让三门峡水电站的汛期得以稳定发电。

在三门峡的十几年，张金良渐渐明白，不能只靠书本上的知识去理解黄河：“河流动力学本就是半经验型的学问，它建立在实践基础上。”也正因如此，他把大量时间花在工地、花在河滩，把每一个数据、每一次出险，都当作必须弄清的功课。

调水调沙成现实

俗话说，一碗黄河水，半碗黄泥沙。

水少沙多，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复杂难治的症结所在。治理的关键，在于让水和沙重新“配平”。

这一判断与张金良团队的探索方向一致——把水沙调控作为突破口，让黄河重新获得自我调节能力。

张金良深知，黄河平均输沙量高，其中相当一部分淤积在下游河床，形成河床高于两岸地面的“地上悬河”。要解开这个结，既要在中上游减沙、拦沙，更要让水和沙在进入下游河道之前“配好比例”。

1999年10月，小浪底水库下闸蓄水。黄河中下游干流有了两座能够联合运用的大型水库，具备了尝试调水调沙的条件。

一个大胆的设想悄然成形：在黄河上开展调水调沙的原型试验。经过无数次推演，张金良和团队成为“吃螃蟹的人”。

2002年7月4日，黄河首次调水调沙试验启动，河段横跨上千公里。张金良统筹协调多个专业组工作。

指令一道道发出，闸门一寸寸提起。张金良站在大坝上，眼见原本相对清澈的出水口，突然涌出浓稠泥浆。

成功了！“那种感觉，就像在指挥一场大战，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。”张金良回忆道。

“当时压力太大。倘若一次调令误差、一个参数偏差，都可能影响整个试验效果，稍有闪失后果不堪设想。”张金良回忆，调水调沙的原理，说到底是以水冲沙。可要在一条真实的、上千公里长的大河上做一次“原型试验”，远比在实验室里难得多。“实验室失败了可以重来，河道上却没有重来的机会。一次放水几千个流量，一旦漫滩、一旦冲毁堤防，后果谁都承担不起。”张金良说。

2004年第三次调水调沙试验中，张金良带领团队利用水库群联合调度，创造性提出“人工塑造异重流”方案——让高含沙水流在预定时间、预定地点出现。第一份调令发出、水流演进上千公里后，裹挟泥沙的浊流从小浪底排沙底孔喷涌而出，人工塑造异重流获得成功，为水库高水位排沙开辟了新途径。

调水调沙的同时，黄河还多次向黄河三角洲实施生态补水，为湿地修复、刀鱼与赤眼鳟等珍稀鱼类洄游产卵创造了条件，也为下游河道留住了持续的生态流量。“黄河调水调沙理论与实践”获201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。

科学探索无止境

张金良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黄河流域图，红蓝标记密布；书柜里塞满泛黄的笔记本，随手翻开一页，都是密密麻麻的观测数据与研究推演。

泾河东庄水利枢纽曾因泥沙难题迟迟未能立项。张金良大胆提出在常规排沙底孔之下再设“非常排沙底孔”，把“蓄清排浑”上升到“蓄清调浑”新阶段。

黄河古贤水利枢纽是水沙调控体系的核心工程，2024年7月开工。面对“千层饼”般的复杂地基，设计与施工单位钻孔近8万米、开挖探洞近4000米，创新方法措施破解难题。

从东庄到古贤，凝结了张金良和团队几十年摸索出的技术路线：把过去主要靠“蓄、排”维持有效库容的思路，推进到“蓄、调、排”全方位协同的阶段。

张金良探索前行的脚步从来没有停下。

为了让黄土高原的淤地坝不再“漫顶连溃”，团队采集上万份土样、历经300多次配比试验，研发出高性能黄土固化剂和防溃决多拦沙可蓄水新型坝工结构，提出了“首级防护、结点控制”的淤地坝系布局规则；为确保黄河下游防洪安全，提出了“高滩建镇安居，二滩生态集成，嫩滩生境成廊，主槽水沙畅通”的“三滩分治”方法。

关于黄河，至今还有“解释不了”的现象：小浪底水库下泄的高含沙水流，行进200多公里后流量不减反增；有的地方偶尔出现“假潮”……

“科学探索无止境。”张金良说。

在张金良的办公室里，办公桌正对面的墙上挂着3个问题——“懂吗？会吗？敢吗？”每天抬头就能看见。这6个字是他的座右铭：“很多困难我们都是第一次遇见，也没有前人留下的经验，所以我们要弄懂、弄会，也要有勇气迈出第一步。”

张金良对“接力”二字看得很重：“我们现在所掌握的知识和技术，来自书本、前辈的积累，也来自实践。我们应该毫无保留地把它传承下去。”

如今，黑山峡、碛口等骨干工程仍在蓝图之中，黄河下游生态廊道、河口三角洲治理保护的构想还在酝酿中，新的考题已经摆在面前。张金良说：“治黄是场接力赛，我得把接力棒稳稳交到年轻人手里。让大河安澜，一代接着一代。”

闻“冲锋”

本报记者 王龙博

“时刻提醒自己不能松懈，要把应急救援的事干好。”今年11月，孙青杰被授予“全国应急管理系统一级英雄模范”称号。面对荣誉，孙青杰坦率而诚挚，“这份沉甸甸的荣誉，既是肯定，也是责任，让我感到无比荣幸和自豪”。

连续14天钉在作业现场，在乱石堆里来回奔走，日均穿梭2万多步……持续的高强度工作，让孙青杰的嗓子嘶哑几近失声——这是他在今年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抢险救援中的工作写照。

孙青杰是湖北人，现为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应急救援事业部五级职员。“面对灾害，我们就应冲锋在前。”孙青杰语气坚定。

作为一线指挥员，他曾参与20多次重大抢险救援任务，战友们都叫他“抢险铁人”。

重庆彭水救援现场危岩高悬、巨石堆叠，高陡边坡乱石密布，加上高温，环境异常恶劣。

孙青杰冒着落石风险反复踏勘、研判地形。巨型孤石挡道，装备难以抵近作业现场。他结合实战经验，组织多机协同打通抢险通道，搭建钻机作业平台，让大型设备得以进场；又科学编组机械设备，分段实施爆破，顺利清除巨型孤石。

救援作业面狭小、出渣通道受限，是摆在眼前的棘手难题。孙青杰采用多台挖机梯次接力倒运、固定点位装车作业模式，打通渣石外运通道，较计划提前抢通国道。

“当时内心倍感振奋。我们提前抢通国道，能为现场后续处置抢出宝贵窗口期。”孙青杰说。

彭水当时正值高温，志愿者为救援人员送来水和冰块。“身上凉快了，心里也暖了。”孙青杰坦言，救援现场群众的暖心举动让他感动。在他眼里，自己守护的“大家”，有着守望相助的温暖。

10月22日，西藏那曲市巴青县发生7.0级地震。次日，孙青杰随队抵达震区，作为安能三局现场指挥部指挥控制组长，他一边紧盯整体指挥，一边牵头调度，负责推进90间板房的搭建工作。

“险情就是命令！”在孙青杰眼中，队伍里的同志们从来都是闻令即上、主动冲锋。

震区高寒缺氧、冻土广布、余震频发。孙青杰深知，救援期间，每一分每一秒都至关重要。抢险前期，因道路通行不畅，孙青杰和战友临时住在帐篷里，夜里寒风刺骨，但没有一个人叫苦。

“我还带了一些年轻队员进驻震区。”孙青杰说，希望年轻队员能在现场磨炼本领，切身体会什么是应急救援的担当。

在抢险救援现场，安全永远是铁律。“在确保群众安全的同时，我们也要防范现场环境风险，关注自身行动安全。”孙青杰说，巴青地震救援中，针对高原环境特殊性，救援队伍全员配齐防寒衣物与高原应急药品，常态化开展余震预警提醒，确保工作安全顺利推进。

“虽然工作很累，但看到当地群众顺利搬进板房、屋里生起火炉那一刻，我觉得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。”孙青杰说。

因为工作的特殊性，孙青杰和家人时常分隔两地，错过不少家庭生活重要时刻。在孙青杰心中，家人的理解和支持，是他在抢险救援一线安心工作的最大底气。“守护好‘大家’，就是守护我们自己的‘小家’。”他说。

新就业形态用工别成“迷宫”

李万祥

一名快递小哥日常接单、配送、服从站点管理，背后却牵扯出8家企业。原来，签合同是一家公司，平台派单是一家公司，发放薪酬又是另一家公司。一旦遭遇工伤、纠纷、欠薪等问题，劳动者往往陷入困惑：究竟谁才是真正的“东家”？维权该让谁担责？

近日，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案，精准破解了这一行业难题。针对多主体参与、关联企业混同用工的复杂乱象，法院穿透层层形式化用工包装，跳出“唯合同论”的固化思维，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走出了错综复杂的用工“迷宫”。

个案折射出万千群体的现实困境。据全国总工会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，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达8400万人，占全国职工总数的21%左右。全国4.02亿名职工中，平均每5人就有1人属于快递、外卖、网约车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。他们穿梭在城市各个角落，支撑起平台经济运转，保障城市民生服务，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。

庞大的新就业形态群体面临普遍的权益短板。我国劳动保障制度以劳动关系认定为核心基础，社保缴纳、工伤赔付、薪资保障、休息权益等所有法定保障，都建立在合法劳动关系之上。没有明确的劳动关系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就容易变成空谈。

现实中，不少平台企业为压缩用工成本、规避法定责任，通过加盟代理、业务承揽、层层转包等方式拆分用工链条，将管理、派单、培训、发薪等用工职能分散到多家企业。有的甚至引导劳动者注册个体工商户，以商事合作、劳务合作的名义，掩盖真实用工关系。

这种层层拆分、多方嵌套的灵活用工模式，制造出不小的权责模糊地带，导致确认用工关系就像走“迷宫”一样。企业看似各司其职，实则相互推诿，最终导致劳动者劳动合同签约率低、劳动关系认定难、社保保障缺失、工伤维权难等，诸多劳动权益难以落地。

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与平台企业的纠纷，司法审判的核心原则始终清晰：认定劳动关系，看实质不看形式。也就是说，法院裁判认定劳动关系，是以实质劳动管理关系为标尺。用工链条再繁琐、包装形式再多样，也不能规避法定用工责任。

一方面，判断是否为用工单位主体，不是依据纸面合同、合作名头，而是看谁真正负责劳动者的管理、考核、派单、薪酬支配，也就是说，谁对劳动者形成实质性人身与经济从属关系，谁就是该负责的用工单位。就算是用工环节被拆分至数十家企业，只要存在实质性用工管理，就必须承担对应的用工主体责任。

另一方面，灵活就业，灵活的是从业形式，绝非法律责任。新业态创新，不能以牺牲劳动者权益为代价。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，离不开千千万万劳动者的辛勤付出，企业不能独享行业发展红利，却通过制度套利、模式拆分逃避责任。

当前，新就业形态群体权益保障，已从单一行业问题，升级为重要的社会治理议题。在政策层面，相关部门持续纠偏平台不规范用工；司法层面，个案裁判立规矩、划边界，持续补齐新就业形态劳动保障短板。

规范新就业形态用工生态，还需要企业主动归位尽责。平台企业应当摒弃规避责任的投机思维，理顺用工链条、规范算法规则、完善保障机制，主动落实用工主体责任。

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，也是最好的兜底保障。唯有穿透用工乱象、厘清权责边界、压实企业责任，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，才能让每一份新职业都被尊重、得到保障，以法治力量托起劳动者“稳稳的幸福”。

本版编辑 王 琳 林语晋 美 编 高 妍